



PURE
PLEASURE

A Guide to the 20th Century's Most Enjoyable Books

阅读的至乐

二十世纪最令人快乐的书

[英国] 约翰·凯里 著

骆守怡 译



译林出版社

PURE
PLEASURE

A Guide to the 20th Century's Most Enjoyable Books

阅读的至乐

二十世纪最令人快乐的书

[英国] 约翰·凯里 著

骆守怡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阅读的至乐:二十世纪最令人快乐的书/ (英) 凯里(Carey, J.)
著; 骆守怡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5.10

(阅读指南丛书)

书名原文: Pure Pleasure: A Guide to the 20th Century's Most
Enjoyable Books

ISBN 978-7-5447-5544-3

I. ①阅… II. ①凯… ②骆… III. ①文学欣赏—世界—20
世纪 IV. 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141472号

Pure Pleasure: A Guide to the 20th Century's Most Enjoyable Books

by John Carey

Copyright © 2000 by John Carey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oby Eady Associates Lt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5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12-253 号

书 名	阅读的至乐:二十世纪最令人快乐的书
作 者	[英国]约翰·凯里
译 者	骆守怡
责任编辑	陈 叶
原文出版	Faber and Faber, 2000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苏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6
插 页	2
字 数	132 千
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2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5544-3
定 价	29.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导 读

王守仁

约翰·凯里是英国牛津大学默顿学院的英语教授、著名学者，撰写过关于英国小说家狄更斯、萨克雷和英国诗人多恩的学术专著，但使他扬名的是 1992 年出版的《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学知识界的傲慢与偏见，1880—1939》。该书站在大众立场，质疑知识分子的精英主义价值观，将现代主义文学产生的原因归结为知识分子把大众排斥于文化领域之外的“阴谋”。在他看来，现代主义作家为了重新控制用文字方式记录的文化，故意使文学变得让大众难以理解，以此阻碍大众阅读文学。凯里的这一论断曾引起争议，却也反映出他深刻的洞察力和浓郁的平民意识。他从 1976 年起在牛津大学默顿学院任教，直到 2001 年退休，堪称学术精英，可他对文学知识界的精英主义价值观并不认同，而是选择与大众站在一起。2000 年问世的《阅读的至乐》旨在鼓励和引导大众阅读文学，其副标题为“二十世纪最令人快乐的书”，是作者为普通人开出的一份推荐书单。

早在 1994 年，美国耶鲁大学英语系资深教授哈罗德·布鲁姆出版过一本《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从捍卫经典的立场出发，研究包括莎士比亚、但丁、歌德在内的二十六位西方经典作家。在结语部分，布鲁姆说：“每个人都会有或应该有一份荒岛书

单。”他身体力行，在书后开出了一份长达四十页的“经典书目”。布鲁姆以自己在大学近四十年的教学生涯为基础，向读者推荐阅读书目，其中不乏伟大作家的不朽作品，现代主义精英作家如弗吉尼亚·伍尔夫和詹姆斯·乔伊斯的意识流小说也很自然地被收录进来。尽管布鲁姆声称《西方正典》“并不专为学术界而著”，但他的“经典书目”数量多，不少伟大作品读起来并不轻松。从实际操作层面上看，普通读者要严格按照布鲁姆的书单去完成阅读任务还是有困难的。

凯里的《阅读的至乐》则是专门为普通读者挑选出二十世纪的五十部作品，都属于好看又好读的好书。他根据一人一书的原则，推荐了三十三部小说及短篇故事集，十部诗集，还有如威廉·燕卜苏的《含混七型》等七部非文学类作品。《阅读的至乐》“挑选的标准是快乐”。凯里在引言《为什么读书？》中写道：

这些图书的入选不是因为它们有“伟大价值”或是体现了人类精神，或是其他类似的理由，虽然无疑有些书即使用这些标准来检验也是杰出的。我的选择标准就是纯粹的阅读愉悦——这些书给我带来快乐，我也希望其他人想起这些书或者接触到这些书就会感到快乐。

这些能够给人“带来愉悦”的书有文学史上公认的名家名作，如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园会》、雅罗斯拉夫·哈谢克的《好兵帅克》、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格雷厄姆·格林的《布赖顿硬糖》、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等，

也有深受广大读者欢迎的通俗文学作品如福尔摩斯侦探故事《巴斯克维尔的猎犬》。凯里有意挑选了一些知名作家的不太知名的作品，如选了约瑟夫·康拉德的《特务》，而未选他的《吉姆爷》；选了詹姆斯·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而未选他的《尤利西斯》；选了约翰·斯坦贝克的《人鼠之间》，而未选他的《愤怒的葡萄》；选了威廉·戈尔丁的《继承人》，而未选他的《蝇王》。这样的取舍有他个人偏好的因素在起作用，但最主要的一个理由是他觉得这些书相比起来不难读。凯里对阅读推荐提出了忠告：

如果你极力推荐一些难读的书，只因为它们以前曾受过好评，那么很可能年轻天真的读者听了你的话以后去尝试它们——而后永远地放弃阅读。

由此我想到中国高校英语专业教师常常抱怨学生不喜欢英美文学课，很难把这门课上好。我们从凯里的推荐书单中或许可以得到对于改进文学课教学的一些启迪：教学内容至关重要，为学生选择的文本不应是一些“难读的书”，而是要能给他们带来“纯粹的阅读愉悦”(pure reading-pleasure)，否则会破坏年轻人的阅读兴趣。

《阅读的至乐》收集了凯里应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之邀撰写的书评，共计五十篇，每篇长度三四页不等。作者经常以概述故事情节入手，引发读者阅读兴趣，随后围绕作品内容或形式的某一方面进行深入讨论，时不时穿插一些作家生平掌故，夹叙夹议，娓娓道来，充分显示其丰富的学识，而信手拈来的引文，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阅读这些短小隽永的书评，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作者对作

品的那份喜爱是溢于言表，忍不住要赶快去读他所推荐的书，而他推荐的理由也令人信服：能够给人带来愉悦的书，其基调自然应该是乐观向上的，因此，G. K. 切斯特顿的《名叫“星期四”的人》作为“文学史上最乐观积极的小说之一”，理应列入推荐书单。凯里向读者传达他的阅读体验时说：“一页一页地翻阅这部小说，你可以回到一个纯真、智慧和希望并存的时代。能让你有这种感觉的书并不多。”《阅读的至乐》推荐的每一本书都有阅读的价值：阿诺德·本涅特在《老妇人的故事》中“对爱和重要性的再一次诠释已经让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来读他”；马克西姆·高尔基的《童年》是“童年的最具体的记录，值得所有的父母一读”；乔治·奥威尔的《上来透口气》是“第一本正视全球污染的英文小说”，“内涵丰富，值得一读”；金斯利·艾米斯的《幸运的吉姆》中“幽默滑稽的描写、文雅犀利的语言让读者身心愉悦，这一点至关重要”。

凯里凭借自己深厚的专业知识，独具慧眼，对作品常常能提出颇为深邃的见解，《阅读的至乐》不乏精当之论。他在对柯南·道尔的《巴斯克维尔的猎犬》进行精辟分析之后指出：福尔摩斯的故事

看似充满了科学和理性，实际上满足了我们的猎奇心理。我们想变得善于推理，却做不到，《巴斯克维尔的猎犬》正是将我们的这种失败戏剧化了，关于这一点，没有什么比这部小说更具典型的二十世纪特色。

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是公认的经典，具有永久的魅力。凯里分析道：“他的如同希腊悲剧一般简单紧凑的情

节像喷泉四周的人工彩虹一样，流露出怀疑的味道，这就是我们百读不厌的原因所在。”

《阅读的至乐》不仅向读者推荐读什么书，而且展示如何读。凯里直面作品，采用细读法，寻幽探微，对文本的感受力细腻而敏锐。他在介绍詹姆斯·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时说：“乔伊斯把全部的人物和事件弱化为斯蒂芬脑海中一掠而过的模糊的回音。”在推荐托马斯·哈代的诗集时，他写道：“哈代的诗歌并不指出悲伤的直接原因，却能深深吸引读者，因为他传达的是个人精神的深邃而丰富，这种精神牢牢扎根于人的记忆和观念。正是这种精神使得诗歌虽然悲伤，却充满鼓舞人心的力量。”凯里的书评写得好，是因为他的文字“充满了人性的深度”，绝非照搬套用西方各种主义或文学理论所能企及。

《阅读的至乐》是指导普通读者去了解二十世纪外国文学的良师益友，帮助我们“重新点燃了阅读好书的快乐”。

为什么读书？ ——一篇挑起争端的引言

到下个千年末，还有没有书籍的存在？这似乎是个杞人忧天的问题，但是，这也是个值得严肃思考的问题。一千年前的世界并非书的世界。那时大多数人不识字，印刷术还没有出现。而一千年后的世界可能远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想象的。H. G. 威尔斯的小说《昏睡百年》中，一个叫格雷厄姆的人从昏迷中醒来，时为2200年，他发现书籍已经成了人们的废弃品。它们被影像取代，在电视屏幕（叫做“电影放映机”）上播放，还被视为任何人都会写的粗鄙语言。

我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有消息说千禧穹顶^①中将不会出现文学的身影。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这大概相当于一个官方的、布莱尔主义的宣判——阅读即使现在没有灭亡，也快走到尽头了。这也许是对的，但也可能是个严重的错误。千禧穹顶不合时宜，因为如果它顺利建成的话，将会制造出大多数人在二十一世纪都避之不及的一样东西，那就是，人群。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世界人口就以每周170万人的速度增长。目前的预测是，到2025年，全球将有

① 伦敦为纪念新的千禧年最先到来之地格林尼治而建，又称“千禧巨蛋”。其展览分成十四个不同形式的主题区域，包括环境、人体、旅游、科技及人类未来工作、生活形态等。但开幕后不久即发现参观人数未及原先预算的一半，运作经费出现困难，于2000年结束后关闭。——译注（本书脚注若无特别说明，均为译注）

86亿人口。如果这个数字每25年翻一番(目前非洲和亚洲的一些地区已达到了这个增长率),那么可以算出,到2330年,人类就只有立锥之地了,因为那时的人口总数和地球面积的平方码数是相等的。

考虑到诸如核战争、瘟疫、饥荒等天灾人祸在达到这个时点之前很可能会发生,那么讨论人口爆炸对阅读习惯带来的影响这个问题好像挺多余的。但是很显然,不论外界发生什么样的灾难,人们对于隐私和独居的态度都将发生改变——这当然就是书籍发挥作用的时候。阅读让人拥有一个内心的空间,这个空间虽然广阔无边,却难为徘徊迷惘的大众所拥有。在地球空间逐渐被用完的时代,它更显得弥足珍贵,成为人们争相追求的领地。目前,读书的人和不读书的人之间的距离在所有的文化分隔中是最显著的,超越了年龄、阶级和性别分隔。对于不读书的人来说,读书人是爱摆架子的;对读书人来说,他们感到困惑:那些不读书的人拿什么充实他们的灵魂呢?如果在明天人挤人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把阅读视为静心明智的救生索,那么这条鸿沟就会弥合——这对人、对书都是件好事。

如果你认为阅读给人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毋须明言的,那你就错了,因为果真如此的话,那应该有更多的人读书才是。实际上,向不读书的人解释读书的意义是非常困难的,而且还会遭遇振振有词的反驳。如果你说读书让人开阔心胸,让人领略各种不同的人生,不读书的人则会回答说看电影和电视也能得到同样的收获。那么读书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答案颇为奇怪——读书的特别之处在于,书籍这种媒介与电影和电视媒介相比,具有不完美的缺陷。电影和电视所传递的图像

几乎是完美的，看起来和它们要表现的东西没什么两样。印刷文字则不然。它们只是纸上的黑色标记，必须经过熟练读者的破译才能具有相应的意义。虽然熟练读者瞬间就能完成破译工作，但是把印刷文字翻译成脑海中的意象是一套令人惊讶的复杂程序。这一过程所需要的想象能力跟其他脑力活动所要求的任何能力都不同。如果阅读消亡的话，这种能力就会消失——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因为阅读和文明是共同发展的，谁也不知道二者是否能够离开彼此独立存活下去。很显然，阅读所要求的想象力，同个人判断力以及与其他人共鸣的能力有着心理学上的联系。没有了阅读，这些能力就会衰退。把印刷文字翻译成脑中意象的工作使阅读更具有创造力，因为对于不同的读者来说，没有哪本书或者哪一页是完全一样的。这里我并不是说读者就是文本的“作者”——尽管这种说法在文学批评家中很流行——好比不能说弹奏肖邦曲子的钢琴家就是肖邦。但是读者就像钢琴家一样，所做的是一件极具创造性的工作。如果你对此工作习以为常，那么也只有在停下来以后才会注意到这一点。放下书本，打开电视，轻松的感觉随之而来。这是因为你大部分的思维已经停止了工作。电视影像的光束直射入你的大脑，你被动接受，并不需要输出什么。这就意味着，与读者占大多数的国家相比较，电视观众占大多数的国家基本上是不用大脑的。我们的国家在二十世纪下半叶从前者变成了后者。

因为大多数人不读书，读书有时被贴上了精英专属的标签。但实际上，阅读并不比走路更具有精英色彩——真要说的话，倒是走路比阅读更具精英色彩，因为你必须自己学会走路，而阅读却是政府花钱教你的。书籍也并不只属于富人。从公共图书馆借书是免费

的。一些人因为太懒所以不愿阅读与走路，这与精英主义无关。我们得承认，有些自诩为读书人的人，实际上搞了许多破坏。他们在公众的脑海中把阅读与卖弄炫耀、附庸风雅联系在一起，吓跑了那些可能成为读者的人。还有一些专家编造出一些“伟大的书”的清单，不断出版。这些令人望而生畏的清单是列给谁看的？当然不是给人类看的。它们倒更像是发送给上帝的期末汇报，好让他老人家看看他的人文子民们是多么具有文化修养。它们也可能是仿照那些被塞进太空舱的功勋卓著的小玩意——一套美国货币、一份《日内瓦公约》、一张DNA分子结构图——编写的，指望被发射到遥远的银河系，让外星人也赞叹一把。

我的推荐书单旨在对所有这一切进行矫正。这些图书的入选不是因为它们有“伟大价值”或是体现了人类精神，或是其他类似的理由，虽然无疑有些书即使用这些标准来检验也是杰出的。我的选择标准就是纯粹的阅读愉悦——这些书给我带来快乐，我也希望其他人想起这些书或者接触到这些书就会感到快乐。我的目标是选出五十本二十世纪的书，于是一开始，我就草草记下自己想找时间重读的书。但这个计划很失败。在我列完乔治·奥威尔、托马斯·曼、伊夫林·沃和D. H. 劳伦斯的作品以后，就已经超出二十五本了。于是我又重新来过，限制每位作家只挑一本书。我还试过平均每十年挑选五本的方法（但是后来发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我只挑出了一本——在那十年中人类一定是忙活别的事情去了）。既然挑选的标准是快乐，那么显然非小说和小说一样具有入选资格，还有诗歌和散文。快乐原则还要求，外文书籍（译本）应该和英语书籍一样可以入选。

虽然并非有意，我的书单中确实回避了同一作者最知名的作品，入选的都是他们不太知名的作品（例如选了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而未选他的《尤利西斯》，选了劳伦斯的游记作品《意大利的晨曦》而不是他的小说，选了阿道司·赫胥黎的《那些不结果实的叶子》而不是《美妙的新世界》）。我不喜欢的或者没有读完的小说自然就被删掉了（例如普鲁斯特和福克纳）。鹦鹉学舌地重复他人的赞美之辞毫无意义，甚至是有害的。如果你极力推荐一些难读的书，只因为它们以前曾受过好评，那么很可能年轻天真的读者听了你的话以后去尝试它们——而后永远地放弃阅读。

我曾经稍稍犹豫过是否应该因为某本书的历史意义而把它列进我的书单——毕竟它们见证了我们多灾多难的世纪的痛苦与喜悦。但这似乎有不信任自己的判断之嫌。并不能因为某本书写了某件历史大事就说它是一本好书，一般来说，这种主题的好书反而更不多见。现在高校的英语系流行将文学政治化——以这种方式进行阶级斗争不用担心危及工资或者生活方式。这里就不得不提到，对于恳求北爱尔兰诗人对动乱发表看法的人们，西默斯·希尼是这么说的：“归根到底，如果这些诗人说的是关于他们自己的心里话，那才值得一听。”因此我就略去了那些靠主题而不是靠内容出彩的书（例如库尔特·冯内古特记述德累斯顿轰炸始末的《五号屠场》）。

有些书因为太出名，所以被我忍痛割爱（比如斯黛拉·吉本斯的《令人难以宽慰的农庄》和洛瑞·李的《萝西与苹果酒》）。不过老实说还是有些很著名的书出现在我的书单里，因为实在抗拒不了它们的魅力。还有的书在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还是放弃了，比如纳博科夫的《洛丽塔》、T. F. 波伊斯的精彩冷酷小说《韦斯顿先生

的好酒》、索尔·贝娄的《只争朝夕》、詹姆斯·古德·科森斯的早期灾难小说《圣佩德罗》，还有毛姆的《人性的枷锁》。现在即使是打出它们的名字都让我心痒痒地想把它们塞回我的书单里。但是其他的书好像都不情愿被挤出来，所以只能维持现状。

我一直都记得H. G. 威尔斯的格雷厄姆和把他吓醒的噩梦中的世界。那里不仅没有书籍，而且拥挤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到处都是混乱吵闹的密集人群。格雷厄姆在重压之下精神崩溃，哭着求别人把他带到小屋里单独待着。这一情节反映了威尔斯对于人口问题的悲观态度。但也让我想到了该选择什么样的书。设想，外面的嘈杂声震耳欲聋，墙都随之颤抖，而缩在小屋里的格雷厄姆却发现角落里有一堆被人遗忘的落满灰尘的书，他打开书后发现它们写于一个自己没有生活过的世纪（因为他是在1899年陷入昏迷的）。这些书必须非常引人入胜，好让他忘记痛苦；它们必须启发他去发掘自己内心的深度；它们还必须时不时让他笑出声来，好让他有继续活下去的渴望；最重要的是，它们必须充满魅力，足以吸引门外一些略懂读写的未开化之人，他们将在格雷厄姆的帮助下让阅读在一个没有书籍的世界里重新活跃起来。这一切设想是一场严格的测试，但我想我推荐的书都过关了。

目 录

为什么读书?——一篇挑起争端的引言	1
1 A.柯南·道尔《巴斯克维尔的猎犬》,1902	1
2 安德烈·纪德《藐视道德的人》,1902	4
3 拉迪亚德·吉卜林《交通与发明》,1904	7
4 约瑟夫·康拉德《特务》,1907	10
5 E.M.福斯特《看得见风景的房间》,1908	13
6 G.K.切斯特顿《名叫“星期四”的人》,1908	16
7 阿诺德·本涅特《老妇人的故事》,1908	19
8 H.G.威尔斯《波利先生传》,1910	22
9 马克西姆·高尔基《童年》,1913	25
10 托马斯·哈代《境遇的嘲讽》,1914	28
11 詹姆斯·乔伊斯《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1916	32
12 D.H.劳伦斯《意大利的晨曦》,1916	35
13 T.S.艾略特《普鲁弗洛克和其他诗作》,1917	38
14 爱德华·托马斯《诗集》,1936	42
15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园会》,1922	46
16 雅罗斯拉夫·哈谢克《好兵帅克》,1930	49

17	阿道司·赫胥黎《那些不结果实的叶子》, 1925	52
18	F. 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 1925	55
19	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乡村医生手记》, 1925—1927	58
20	西尔维娅·汤森·沃纳《幸运先生的空想》, 1927	61
21	伊夫林·沃《衰落》, 1928	64
22	罗伯特·格雷夫斯《向一切告别》, 1929	67
23	威廉·燕卜苏《含混七型》, 1930	70
24	W. B. 叶芝《诗集》, 1933	73
25	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诺里斯先生换火车》, 1935	78
26	伊丽莎白·鲍恩《巴黎之屋》, 1935	81
27	约翰·斯坦贝克《人鼠之间》, 1937	84
28	格雷厄姆·格林《布赖顿硬糖》, 1938	87
29	A. E. 豪斯曼《诗集》, 1939	90
30	乔治·奥威尔《上来透口气》, 1939	93
31	基思·道格拉斯《从阿拉曼到遮姆遮姆神井》, 1946	96
32	托马斯·曼《骗子菲利克斯·克鲁尔的自白》, 1954	99
33	金斯利·艾米斯《幸运的吉姆》, 1954	102
34	威廉·戈尔丁《继承人》, 1955	105
35	V. S. 奈保尔《神秘的按摩师》, 1957	108
36	S. J. 佩雷尔曼《安宁之路》, 1957	111
37	W. H. 奥登《短诗集: 1927—1957》, 1966	114
38	君特·格拉斯《铁皮鼓》, 1959	118

39 缪丽尔·斯帕克《布罗迪小姐的青春》,1961	121
40 让-保罗·萨特《词语》,1964	124
41 西默斯·希尼《自然主义者之死》,1966	127
42 史蒂维·史密斯《青蛙王子及其他诗歌》,1966	130
43 泰德·休斯《乌鸦》,1970	134
44 伊恩·麦克尤恩《水泥花园》,1978	138
45 克莱夫·詹姆斯《不可靠的回忆录》,1980	141
46 约翰·厄普代克《兔子四部曲》,1991	144
47 菲利普·拉金《诗集》,1988	147
48 维克拉姆·塞特《金童》,1993	151
49 石黑一雄《未能安慰的人》,1995	154
50 格雷厄姆·斯威夫特《最后的遗嘱》,1996	157
后记:读者来信漫谈	160
致谢	165
附录:中英文对照书目	167